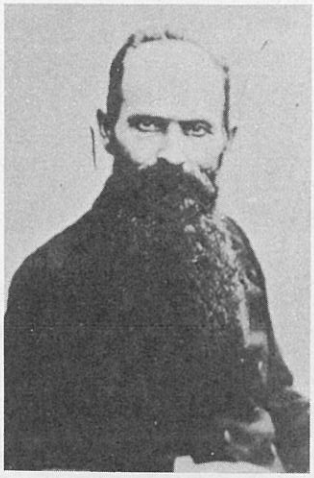
立志作一個不辱使命的醫者——馬偕



距今一百零九年前，天津發生焚燒教堂的民教衝突事件，翌年，即西元1871年10月19日，一位年方二十七歲的年輕牧師卻從加拿大多倫多出發前來台灣。經過二個月的海上旅程，他由打狗（高雄）登陸，先駐在台南府城，並訪問南部各地教會，研究有效的傳道方法。當時，他聽說台灣北部有許多城市，人口密集，卻沒有宣教師在那裡工作，於是他決定獨立開拓北部教區。隔年3月9日他抵達淡水，又沿淡水河進入台北大稻程，艋舺等商埠，終於決定在淡水開始傳道工作，這位青年牧師就是北部教會醫療傳道的先鋒，淡水馬偕醫舘的創立者——馬偕博士。

馬偕博士於1844年3月21日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的 Oxford colty Eorra 村，14歲師範學校畢業後任職小學教員達五、六年之久，21歲時進入多倫多大學及 Knox College 神學院深造，後來轉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東方語學、佛教、婆羅馬教教典，於1870年畢業。馬偕牧師雖然不是醫師，但他曾在 Toronto（多倫多）及 New York（紐約）修習醫學，所以對醫藥知識有相當之研究，1872年他由打狗（高雄）來到淡水以後，傳道之餘常替當地人看病，後來因爲求醫者漸漸多起來，他便租一間房子開設醫舘，並請領事舘領事侍醫林格（B.S. Ringer ）助理醫務，又獲得淡水和台北的外國洋行醫師的幫助，並供應許多必須的藥品。1872年6月21日馬偕醫師的日記上寫道：「五行（當時計有五種商行，稱五行）的醫生Dr. Franklyn 來幫忙診所的工作，我給他50元爲報酬，並從他那兒買來一些藥。」由他的日記，可推知當時醫務的狀況。







▲馬偕肖像（左上）▲馬偕與家人合影（下）

在開辦的第一個月，共有130位門診病人，同時也向外國商行募集了272美元作爲醫療基金，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從1873年到1880年間，在林格醫師的協助下，奠定了淡水基督教醫療事業的良好基礎，其中最大的成就是：1879年林格醫師在淡水解剖了一具因大動脈瘤破裂而死的葡萄牙屍體，他自肺臟的支氣管內發現了一種新寄生虫定名爲 Distoma Ringeri ，即現在所謂衛氏肺吸蟲（Paragonimus Westermani ），這是世界醫學史上肺吸蟲在人體寄生被發現的首例。

當時台灣最普遍存在的疾病爲瘧疾，馬偕牧師以奎寧治劑加入檸檬汁中作爲病人的飲料，如此治癒了許多病人，這藥當時被稱爲「白藥水」，許多遠處的病人家屬，均風聞而至淡水，取藥回家給病人飲用。

那時台灣的居民普遍缺乏口腔衛生的觀念，而民衆又大多有吃檳榔的習慣，故蛀牙的人不少。1873年，馬偕牧師率同學生離開竹塹（新竹）時，有一群士兵來監視他們的行動，其中有一位士兵罹患猛烈的蛀齒痛，於是馬偕找一片堅木，拔去了士兵生痛的蛀齒，他只不過運用了原始拔齒法而已，而該士兵竟感謝得很。馬偕自獲得這經驗以後，乃託當地鐵匠製造幾種拔牙器具，並向美國購置拔牙機。他率領學生信徒旅行各地傳道，通常站在一個空地上或寺廟的階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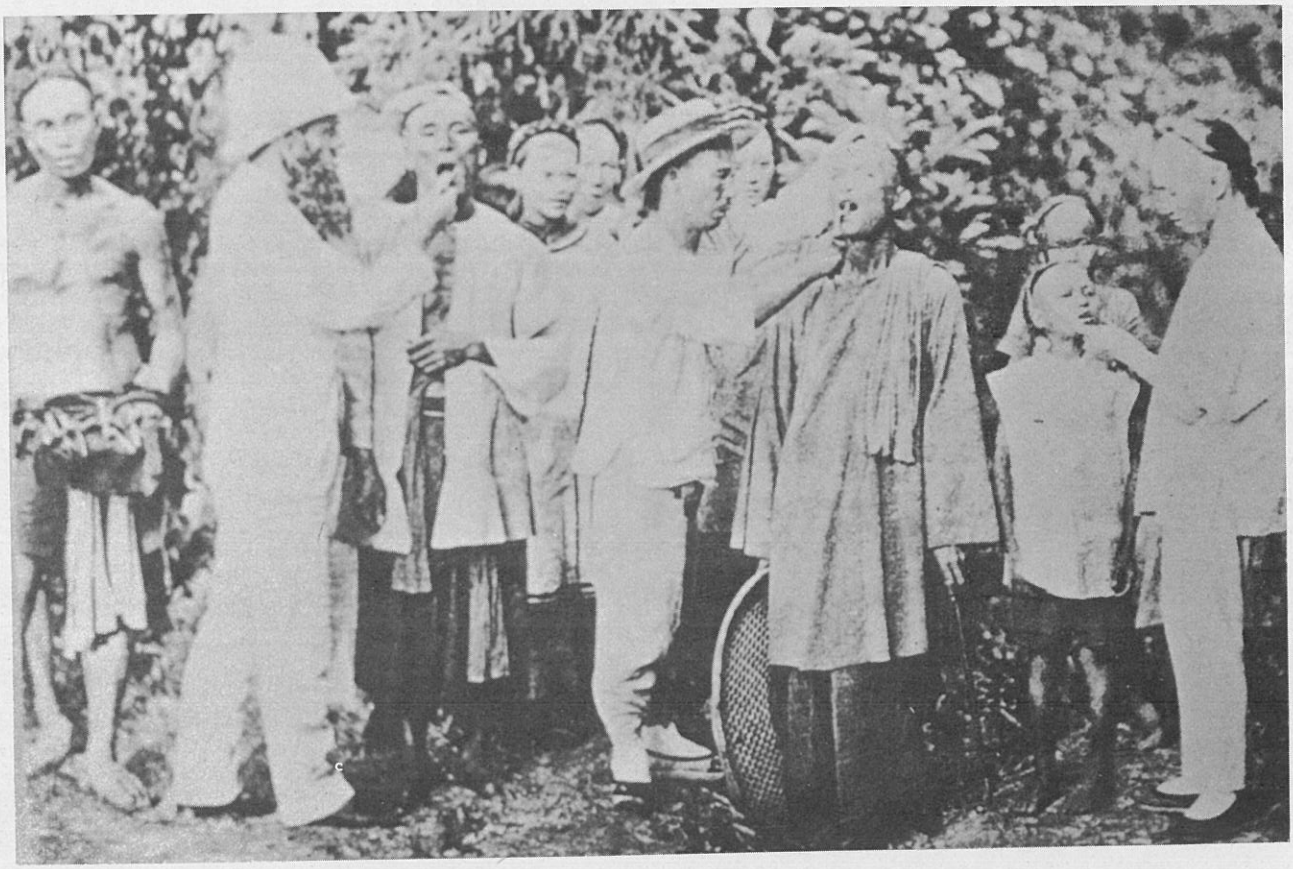
，先唱一兩首聖歌，而後替病人治病，拔牙。拔牙時，病人通常站著，牙齒拔下之後，交給病人，放在他們手上，若保留其牙齒，將引起他們的懷疑。馬偕牧師曾統計過，他親手拔起過二萬一千個以上的牙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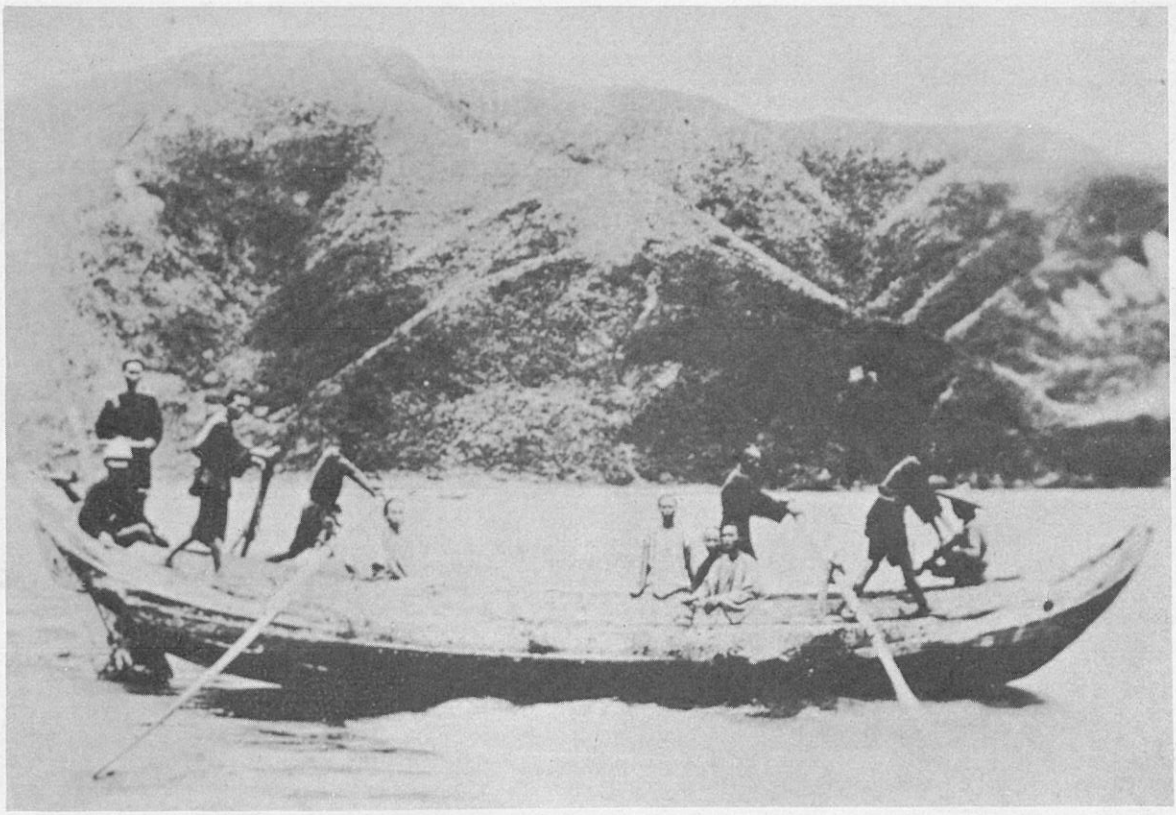
馬偕牧師發現拔牙實際上比其他任何工作，對於破除一般民衆的偏見有更大的效果，因爲當他替病人醫好瘧疾或其他疾病時，常被地方「道士」誤解爲不是他的藥物之效，而是他們所拜的神明之「保庇」，然而馬偕牧師替他們拔牙，解除他們的齒痛，則是非常明顯的事實，使病人對他產生信心，不再妄托是神明之「保庇」

馬偕牧師的最終目的是宣教傳道，醫療工作只不過是手段而已，這可由以上的事實和他的著作中發現。他在其著作Far from Formosa中記載著：「醫療對於傳道工作的重要性，已經毋須再強調了，這是凡知道近代基督教宣教史的人所不可否認的，我們在台南的醫療工作經驗裡，也證明了這道理。……在我預備作海外宣道工作，所接受的各種訓練中，沒有比我在多倫多及紐約所受的醫學訓練更確實有用的。」雖說馬偕牧師的醫療工作是一種傳教的手段，畢竟他對台灣的醫療工作，大衆的健康，有其不可抹煞的業蹟，因此這也是無可厚非的。

馬偕在北部的傳教事業發展得很快，到光緒三年時，他已先後在五股

▼馬偕牧師及其助手替病人拔牙





▲馬偕牧師乘坐木船由蘇澳前往花蓮

坑，和尙洲（蘆洲）、新店、三重埔、鷄籠（基隆）、大龍峒、錫口（松山）等處建立佈道所。

艋舺是當時台灣北部地區貿易最興盛，市街最繁華，人口最密集的街市，也是一個傳統習俗最深，排拒外人最厲害的地方。同治十一年，馬偕牧師和他一位中國信徒嚴清華去艋舺傳教，曾受到強烈的排斥，他們每次去挨家訪問，走過街頭時，都受到誹謗、嘲笑和凌辱。正因爲艋舺的排教力量特強，馬偕牧師愈重視這地方。他到艋舺傳教首先遇到的問題是無法租到房子，因爲當地官吏曾下訓令：「若以家屋或地產貸與外國傳教師或賣給外國傳教師者，一律處以嚴罰。」可是馬偕在這種嚴厲的法令下，於1877年竟借得一所家屋，在那房門口掛上「耶穌聖堂」的匾額。當地的，到淡水河岸雇條船逃往大龍峒，但是他仍不死心，又乘著黑夜歸返艋舺武官看見後十分氣憤，竟率領一隊士兵，指說該地是軍營建築地址，命令馬偕即時撤走，馬偕不得已只好與他約定隔日即自行搬走，翌日清晨，馬偕步出家門，群衆卻聚集在路旁，對馬偕投以泥、土、瓦礫，馬偕脫身後，在寂靜的街道上，步行再找尋房子，幸而遇著一位老者，才再找著房子，隔天，他又在那間房子戶外掛上「耶穌聖堂」的匾額，市民一見又大爲憤怒，但馬偕仍不顧一切到街上施行醫術，治療齒痛的病人。由此可知，



▲馬偕牧師與台灣居民合影

馬偕牧師初期醫療傳道工作的艱難，但無論遭遇任何挫折，均抱以堅忍不拔的決心與毅力來處理，他的座右銘爲：「Rather burn out than rash out」。這樣日子久了，馬偕的誠心感動了一批人，在數年間，馬偕終於獲得一片土地，在艋舺建立起一所教堂。

1878年5月27日，馬偕牧師在淡水英國領事舘內結婚，馬偕夫人張聰明小姐，係廬州五股坑人，她熟悉本地的風俗習慣，對於醫療傳道的工作很有幫助。

1880年，美國底特律一位熱心的馬偕夫人（其夫與馬偕牧師同姓），知道台灣北部的醫療傳道工作的成就與意義，並爲紀念其逝世不久的亡夫，乃捐獻美金三千元，由馬偕牧師選定淡水田仔街教堂隔壁，建築一所台灣北部最早的基督教醫院，定名爲「滬尾偕醫舘」（因淡水很熱鬧，像上海（滬）的尾巴，所以淡水又稱滬尾）。醫舘前面爲門診部與藥局，院舍可容納約三十人的住院設備，剛開設時，是以馬偕牧師爲醫院的樞紐，後來才有駐淡水的約翰生醫生和歷尼醫師前來協助醫務。

爲了醫務的需要，馬偕牧師每晚必自修醫學書籍，遇有疑難，就向洋行的醫師請教，同時也訓練年青的助手。每天下午讓他們至醫院實習，其中郭希信、林清火、陳能、林有能及柯新約等，後來都得到正式的醫師開

業執照。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法國軍艦砲擊基隆、淡水兩港，中國水兵多人員傷，此時馬偕醫院遂負起治療纏纏傷的工作。

但一般民衆仍誤解馬偕等與法國通謀，遂大舉破壞各地的禮拜堂。爲此，劉銘傳乃以一萬元作爲賠償台北地區教會的損失，另一方面也對該醫舘在戰時的服務表示謝忱。馬偕牧師便以這筆款項修建教堂，也增添醫院的設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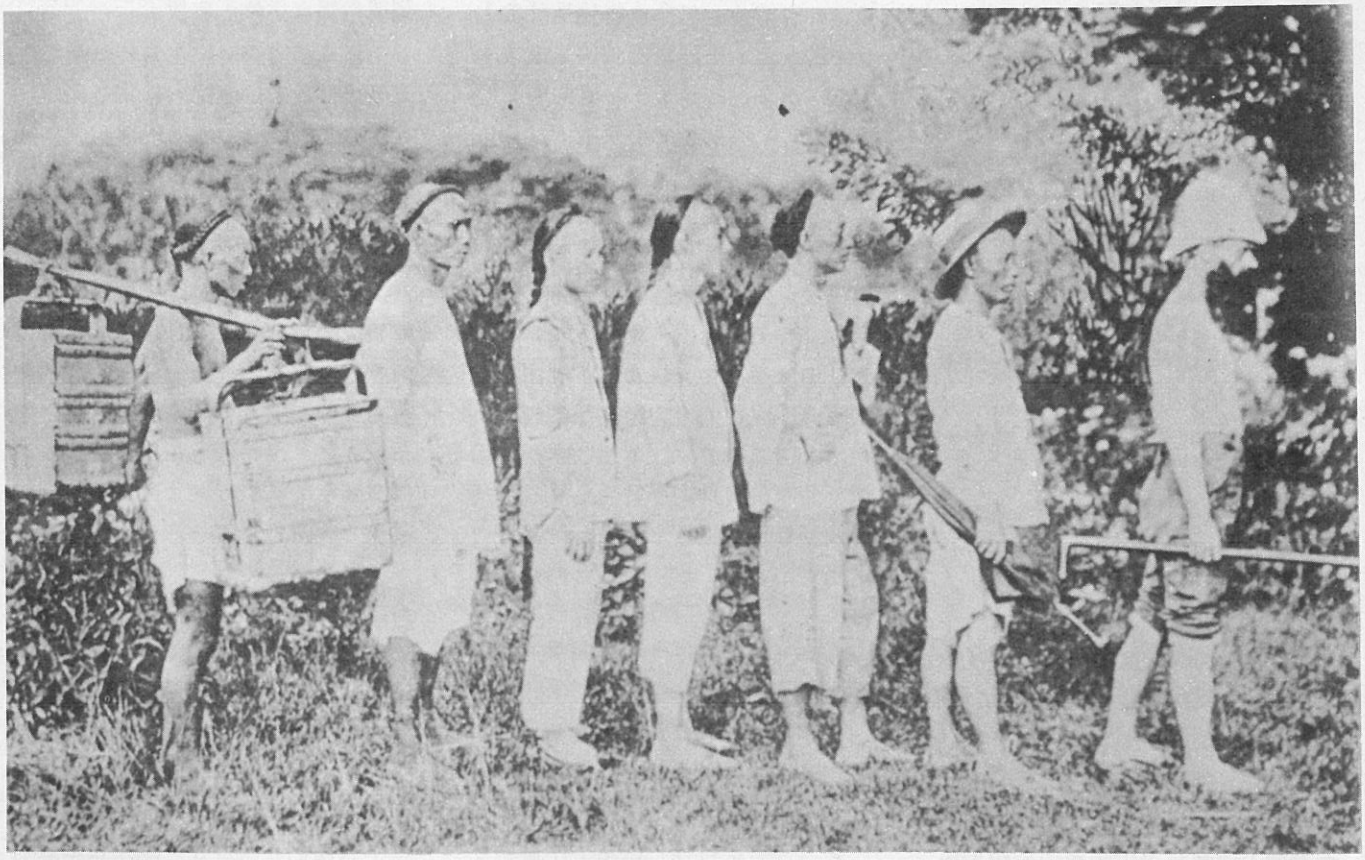
淡水醫舘繼續維持其醫療工作二十年，直到1901年6月馬偕牧師逝世時，才暫時停止其醫療工作。

1905年11月，宋雅各醫師（Rev. G.V. Ferguson M.D.）偕夫人到淡水，重新經營已關閉五年的馬偕醫院。此時淡水馬偕醫院已不敷使用，教會決定將醫院由淡水遷至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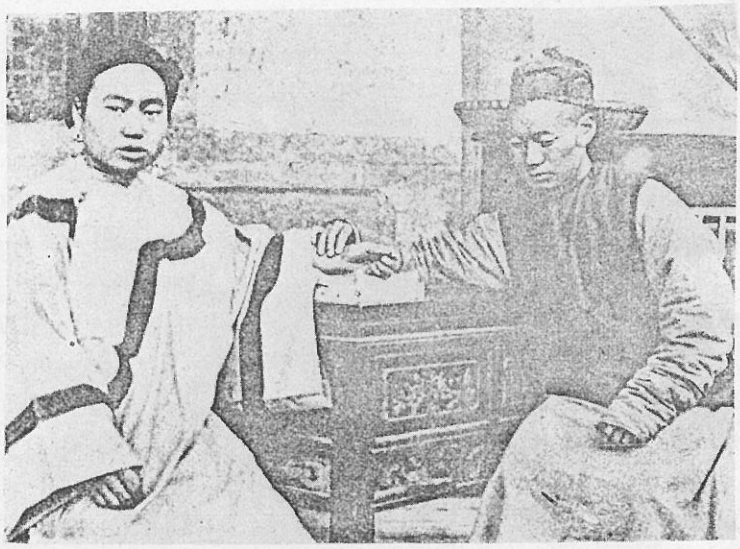
1911年於台北牛埔庄（雙連）購買土地，興建新醫院。1912年12月26日落成，爲了紀念馬偕牧師，命名爲「馬偕紀念醫院」（Mackay Memorial Hospital），此後院務先後由宋醫師、倪醫師（Dr. A.A. Gray），及連醫師（Dr. Kenneth. A. Denholn）負責。不久，第一次大戰爆發，馬偕醫院受其影響，藥品短缺，醫護人員缺乏，終於在1918年停辦。

1923年，戴仁壽醫師來台時，院務才復行開始。

▼馬偕牧師帶領信徒前往村落傳教



台灣現代醫學的萌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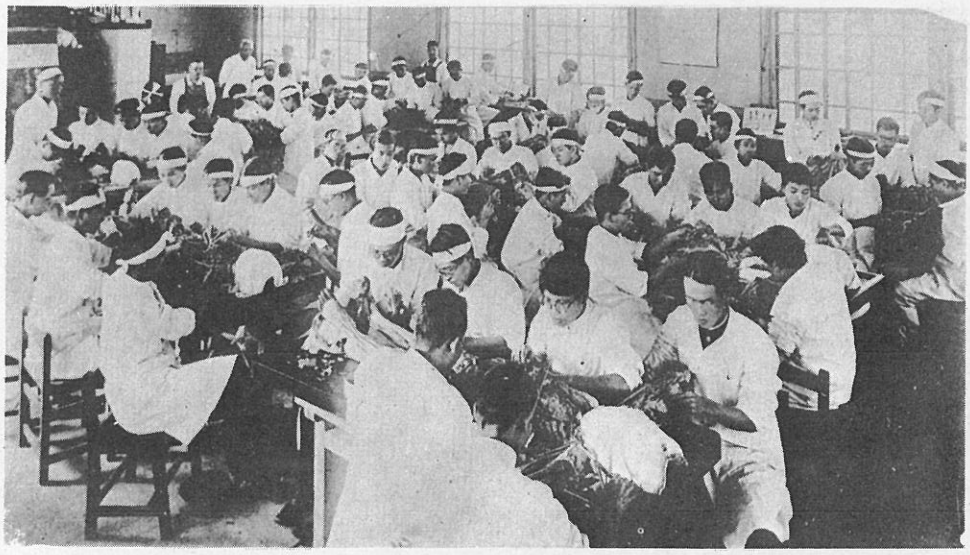


▲漢醫替病人把脈

一八九七年台北醫院院長山口秀高利用該院創辦「台灣土人醫師養成」，這是台灣現代醫學的萌芽點。在此之前台灣的傳染病盛行，但只有漢醫故未能有效控制；當時漢醫的社會地位很高頗受病家的尊敬，病人請他去看病，醫藥費是不能當面送給他的，必須將錢用紅紙包起來，等到漢醫看完甚要回去的時候，派一個人跟在他的後面走，一直走到大門外人少的地方才扯住他的袖子（他的袖子有一尺多寬，而且很長能垂到膝蓋以下）把紅包送到他袖子的時候，他明知道是送紅包給他，但他自認爲是社會上高尚的人士，不好意思回頭來接受，還裝作不知道的樣子，一直向前走，嘴卻說：「不要啦！不要啦！」而手卻直抓紅包，等到抓過手即揚長而去。

當時的傳染病有瘧疾、傷寒、鼠疫、天花、霍亂等，經常三五年就肆虐一次，此外寄生蟲病（如肺吸蟲病）和肺炎、肺結核、梅毒也相當多。因此山口秀高在一八九七年利用台北醫院（即現在的台大醫院）創設「台灣土人醫師養成所」，招收國語傳習所（公學校前身）畢業生，教授普通學及醫學，此爲日本人在台灣醫教育之始。兩年後正式成立「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當時醫學校的修業期限共有五年，預科一年，本科四年。預科讀的是物理、化學等基本科學，本科四年讀的是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投考的資格是十六歲以上的公學校畢業生，一進入醫學校接觸到的即是化學、物理等新鮮科目，但是不作實驗，只是整天記化學方程式和演算公式。醫學校成立之初，本省人因爲聽說要解剖死人，很少願意把子弟送去就讀，所以醫學校不得不出錢招請學生來就讀，後來投考的人多了，投考相當困難，但是每月仍有公費可領，一直到改爲醫專才停止發放。

那時的實習醫院在當時號稱是東南亞規模最大的醫院，耗資之鉅連日本政府都感到吃不消，內部設備富麗堂皇，一般住院病人水準也較高，因此在那裏的實習學生比較不敢動手去作。赤十字社病院，當時在醫學校附近，是眞正的教學醫院，經常有供教學研究的免費病人，且醫院的全體醫師都是醫學校的教員，所以對於學生實習非常方便。當時學生雖只是中等學校程度，但每個人在未入醫學校前都有幾年的私塾經驗，漢文底子很紮實，可說是台灣當時的高級知識份子，尤其不必爲考試所束縛，很能發揮自由研究的風氣，在學問上大有建樹的杜聰明博士及在領導台灣民族運動頗有事功的蔣渭水，可證明當時教育的成功。但是最初一般人對於這些醫學校畢業生並不太信任，有人甚至將他們視爲「江湖郎中」，後來因爲那些小西醫們表現良好，以及日本政府



▲五十年前醫學生的解剖實習

的扶植政策，西醫很快地就獲得了崇高的社會地位。當時醫學校畢業之後隨即開業的佔大多數，而且大部份是在鄉下，出診時有騎馬的，也有騎脚踏車的，也有用人力車的，在鄉間不辭勞苦地奔走治病，不管晴雨只要病家來請一定出診，他們堅守當時台灣第一線醫療工作的崗位，負起維護台灣同胞健康的任務。

一九一八年醫學校改作醫學專門學校（簡稱台北醫專），初期修業年限爲預科四年，本科四年，一九二一年以後，招收的對象改爲中學畢業生，修業年限四年，一二年級是基礎醫學，三四年級是臨床醫學。

當時學生每天帶著便當上學，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一邊聽教授們講課，一邊一字不漏的抄寫筆記，如有聽不懂的地方，一下課，就借同學的筆記來，補抄漏掉的部份，教授的筆記成爲學生最主要的知識來源。一般書籍價格相當昂貴，所以非必要時都不買。

一年級上的「解剖學」分「系統解剖學」和「組織學」二部份，由兩位教授分別授課。課程快結束時，就開始大體解剖實習，全班六十人分成十組，一組六人分配一具屍體。到了三年級開始上臨床醫學，但眞正與患者接觸的機會，一星期中只有上臨床講義的兩小時而已。其他時間和從前一樣，帶便當，從早到晚，抄寫筆記。上臨床講義課時，學生一排一排的高坐在階梯式的座位上，穿白衣的護士，用推送車將患者送進來，放置在中央。由教授叫出五、六個學生出來，排在前面，於是由醫局員報告患者的病歷，接著，教授開始授課。有的教授，從患者的病歷，慢慢講到診斷和治療，說明得清清楚楚，有條不紊，讓被叫出來的學生，聽得入耳。但也有教授僅僅讀一下患者的病歷、和診斷病名，然後就將患者和排在前面的學生丟在一旁，使得患者和學生呆然若失。儘管如此，上課時，已能和患者拉上關係，興趣也就提高了。

四年級時，門診實習就開始了，四、五人分成一組輪流到各科門診實習。那時有兩座實習醫院，一是附屬醫院的紅十字社台灣支部醫院，一是台灣總督府醫院（現在的台大附設醫院），學生們每天在這兩座醫院之間忙碌奔走，接受各科教授的指導。

一九三六年台北帝大醫學部成立，學生是由高等學校畢業後直接升入，原有醫專改稱附設醫學專門部，兩者同時並存。一九三七年台北醫院，正式改組，成立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設醫院，當代日本有名氣的少壯派教授，如病理學的和氣教授，生化學的富田教授，生理學的細谷教授，婦產科的眞柄教授都相繼來台。這一年七七事變暴發，戰爭如火如荼的進行著。每天的報紙，都大肆報導「皇軍」的勝利。日本人莫不得意洋洋，他們把「出征」視同要到什麼地方「徒步旅行」一樣，到處都在舉行慶祝宴，影響所及，日籍醫師大都應召出征。那時候，日籍醫師與台籍醫師之間，表面上看來倒很融洽，安然無事。大家互相拍拍肩，彼此點點頭和睦相處。但是只要在宴會上，酒過三巡，他們就藉酒裝瘋，這時平日埋藏在他們心底的優越感，也就表露無遺。總之，日本人對待台灣人，總是心懷叵測界限分明。在某種程度內，沒有問題。一旦超越界限，就以異己分子，斷然無情排斥。

在中國大陸的戰事逐漸擴大，因此揹著背囊，戴著鋼盔，佩著日本刀的所謂「皇軍部隊」，在太陽旗的歡送之下，經過三線道路（今之中山南路）出征的次數也就越來越多了。當時醫院的日籍醫師和職員，大半應征



▲荷蘭人筆下的早期台灣居民生活

入伍了，他們已沒有像「徒步旅行」那樣的輕鬆氣氛了，步伐都顯得非常沈重。背著「千人針」（日本的一種迷信，在一塊布上，由一千位女人，各縫一針，贈給出征的人，以祝平安之意）以祈武運長久的人也越來越多了起來，因此醫院內各科的醫局，幾乎已成了台灣人的天下了。民國三十二年，戰局已從所謂「大東亞戰爭」演變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了，日本人沒有像以前佔領香港、新加坡、菲律賓時那樣的歡呼，得意，局勢顯然已扭轉了。台灣人也逐漸被徵召充當軍屬或軍夫，台灣醫師們同樣地也被徵召服役了。漸漸地可聽到台北上空B 29轟炸機的吼叫聲，終於在幾個地方，都投下了炸彈，受傷者一個個被送進醫院，這時，地下室就權充臨時手術室。因此，一瞬間，地下室顯得擁擠不堪了。橫七豎八的病床，就像菜市場的菜攤一樣凌亂。受傷的患者，在生死之間，掙扎搏鬪，哀鳴哭叫，再加上那永遠驅不散的藥水味、汗氣味，就像菜市場內，永遠存在的魚腥味及爛菜的臭味一樣，醫師和護士們就在那裏穿梭不停地致力於急救工作。不久第二次轟炸又開始了，於是第二批傷患又蜂擁而至，急救工作馬上又開始，因此醫生和護士們日以繼夜忙碌不停。局勢的發展，越來越對日本不利，空襲警報，也越來越頻繁，市民們開始疏散，不久醫院也疏散到中和，然後又疏散到大溪，只有一部份，留在台北本院，繼續工作。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台灣重回祖國懷抱，於是戰爭結束了。不久，醫院從大溪遷回來，搬運回來的儀器，大都破損不堪，手術器械丟失不少，剩存的也已經生了銹，儘管如此，在玻璃窗裡，就開始門診，並用生銹的刀剪開始動手術。日籍教授除了酒井潔博士等兩三位外，其他全部被遣送回日本了。這時杜聰明教授擔任第一任醫學院院長，接管了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及醫院。醫學部的病理教室在戰時受到直接轟炸而倒塌了，醫院的會議室、第四病房以及餐廳一角，也被炸掉了，中央走廊的前邊被炸得留下一個大洞，眞是滿目瘡痍，一切百廢待舉。不久我國先遣部隊，從大陸來台灣，歡迎的旗幟隨風飄揚，到處可以聽到鞭炮聲，家家戶戶門口也都懸燈結彩。

這時，被暴風吹破的玻璃窗，已經剝落的水泥牆壁，以及直接被轟炸的地方，瓦礫堆集如山，一切都未修復。這期間，大學校長頻頻更換，醫師的薪水，常常一兩個月領不到，一切都在不安定中，偌大的醫院好像在喘息中過日子。在那個時候，不知道什麼緣故，很多人都反對校長，因此，醫學院的學生實行罷課，附屬醫院也弄得雜亂無章。屬於少壯派的醫師，每日都在開會，研討對策，電線桿和牆壁上都貼滿了宣傳畫和標語。一陣暴風雨過後，學園已是千瘡百孔。

那時台大醫學院爲了提高台灣的醫學教育水準，已於接收改組時，停辦了台北帝大時的附屬醫學專門部，並將該部遺留下來的學生編入先修班，等到補修完課程後改編入醫學院。在三十五年二月以後由日本返台醫學生中，有不少醫學專門學校學生，也須要由台大收容續予教育，所以醫學院又爲他們設立一個臨時性的「附設醫學專修科」；一直到三十九年六月爲止。因此第一附屬醫院就供醫學院學生，而第二附屬醫院供專修科學生的臨床教學及實習之用。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第二附屬醫院由長官公署接收，改爲省立台北醫院。這時從日本及大陸來的教授群，如東大出身的嚴智鍾教授，千葉醫大出

身的病理學葉曙教授，東大出身的魏火曜教授，魏炳炎教授，高天成教授，高遠逵教授等個個都是權威的人物，替台灣醫學帶來了一片蓬勃朝氣。但是當時物質條件太差，整個大學未上軌道，醫院的行政管理也很糟，院內到處是破、亂和髒，那時一般社會有一種變相的「民主作風」，校內也難免有此風氣，院內此風更盛。因爲人事問題，附屬醫院醫師們和台大當局起衝突，而醫師們空前絕後的罷診事件就在此時發生。不久「二二八」事變發生於全省，整個社會在不知不覺中，陷於混亂，槍傷患者一個一個地被送到醫院，馬路也不能通行了。

那時小兒科在四樓，起初只有三十八張病床，自來水常枯竭，必須從二三樓搬水上去，電氣消毒器也常壞，注射器的消毒常來不及應急，調乳室未修不能使用。床是大人用的，既大又矮。但是醫師們發揮克難精神，用自做的點滴注射器開始以輸液治療腹瀉症。國外的雜誌也未進來，一切都是靠自己的經驗和研究去開拓改善。那時外科有兩個，即第一外科和第二外科。由徐傍興教授主持第一外科，由高天成教授主持第二外科。第一外科的醫師們，大半是從日本回來的年輕小伙子，他們之中，熟諳英語和法語的人也不少。醫院雖然依舊，被轟炸的地方，多已修復，患者們也都能遵守紀律。光復時的一些怪現象，已不復見了。但是那時外科只是一般外科而已，僅著重於甲狀腺與腹部外科。因此一旦遇上骨折患者，就沒有專門擅長整形外科的醫師。只好臨時抱佛脚似的翻翻貝勒博士的「整形外科學」，再摸摸患者的骨頭，來作診斷。這樣，總是不得其門而入，更無法作專門性的探討。

三十七年七月莊長恭先生繼陸志鴻校長之後，任台大第三任校長。杜聰明教授接嚴智鍾院長重任醫學院院長。附屬醫院院長陳禮節教授辭職返故鄉福州，杜院長提聘魏火曜教授兼醫院院長。那時大陸局勢漸漸不利，台灣社會情緒不安，校內各方動搖，醫院也多事了。魏院長就任不到一星期，就有某講師被一個無理取鬧的該校外省籍學生患者打了一個耳光，事情鬧到要請莊校長親自調解。又學校解聘了十多位教授，其遣散費要醫院負擔，如此煩雜的事情不斷地發生。

三十八年一月傅斯年先生就任台大校長，傅校長特別關懷附屬醫院，費了許多心血和時間，極力想把醫院改進成爲東亞最好的教學醫院。那時大陸遷台的同胞日見增多，在那社會不安的環境下要改進台大醫院，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醫院內時常鬧事情，各報天天批評攻擊。例如：有些剛從大陸到台的病人，全家搬進病房當旅館住；隻身在台的肺癆病人一住兩三年，因無家可歸把醫院當做救濟院，一文不交拒不肯走；有一官員在醫院病故，其同事成群要打醫師，鬧得滿城風雨；病人與藥劑生打架，院長被法院傳訊；一軍人戀上女醫師被拒，在門診部當衆開槍自殺被救；一士兵擅自佔住醫院辦公樓一隅，不但不遷出且携槍示威，幸賴傅校長致某司令的一封信才得無事；保安機關突然派員到院，逮捕數名附匪醫師等等，眞是一波未平又一波。

三十九年省府撥巨款修復了被炸的樓房及全院的門窗玻璃，醫務之改進也漸有成就，如護理部之改善及附設高級護理職業學校之創辦，供應室及嬰兒室之設立，病人在院內自炊之禁止，住院醫師制度之樹立，三個內科和兩個外科之合併爲合一科，急診處及實驗診斷室之成立，放射線科之充實，及臨床病理和各種討論會之進行等等。